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

# 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

沙培德、張哲嘉 主編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 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

沙培德、張哲嘉 主編

中央研究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 / 沙培德, 張哲嘉主編. --

臺北市 : 中研院, 2013. 10

面 ; 公分. --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集, 第四屆)

ISBN 978-986-03-8730-8(精裝)

1. 學術思想 2. 翻譯學 3. 文集

030.8

102022440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 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

---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

發行人：翁啓惠

總編輯：黃進興

主編：沙培德 (Peter Zarrow)、張哲嘉

出版發行：中央研究院

印刷者：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450 元

出版日期：2013 年 10 月

---

GPN 1010202481      ISBN 978-986-03-8730-8 (精)

---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之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負文責。

# 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 余英時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召開國際漢學會議是在一九八〇年，原本希望以後每十年召開一次。今年是第四屆，但距第三屆已十二年，算是遲了兩年。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九年已有人提議本院應該召開漢學會議。當時的院長是胡適之先生，他認為台灣的漢學研究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緩議。這一提議卻引起了她對於所謂「漢學中心」的記憶和感慨。他說：

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陳援菴兩位談起將來漢學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現在法國的伯希和等老輩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漢學家現在連唐、宋沒有標點的文章，往往句讀也被他們讀破了。所以希望漢學中心現在是在台灣，將來仍在大陸。

但六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漢學中心」說已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試一回顧過去五、六十年間漢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認識：

第一，漢學已加速度地擴散到一切專門學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部門中都包涵著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而且在中國科技史的廣大領域中，自然科學的各部門也和漢學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於是出現了一個奇詭的景象：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但是漢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卻並不獨立存在，因為漢學研究基本是寄托在其他學科之中的，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之類。

第二，二戰以後各國漢學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出現。不用說，漢學研究在各國活躍的情形頗不一致，但即使是最活躍的國家也未曾取得公認的「中心」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分別考察各國漢學研究的大體趨向，便不難發現：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漢學研究的傳統也不能不是多元的，這是我們今天共同承認的基本事實。

基於以上兩點新認識，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當年最所繫心的「漢學中心」何在的問題，今天已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如果有人堅持要在這個問題上討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祇好說：漢學猶如十六世紀布魯諾（Giordano Bruno）構想中的宇宙，其中心無所不在，其邊緣則無所在（“Its center is everywhere, its periphery nowhere.”）。

自本院一九八〇年召開第一次會議起，我個人每一屆都曾參與準備工作。因此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我們的唯一目的便是給世界各地漢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充分交流的學術平台，所謂「漢學中心」問題從來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我們承認並且尊重每一地區漢學傳統的獨特風格，但是我卻不願看到任何漢學研究社群走上自我封閉的道路。因此不同傳統之間的互相溝通、互相認識和互相影響是極其必要的。我們相信，過去本院主持的三次會議多少曾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我們希望本屆會議也能作出同樣的貢獻。

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感謝各地漢學同道們前來參加會議，特別是遠道冒暑而至的朋友們。我預祝大家有一次成功而愉快的學術聚會。

我個人因事不能到會，謹致最深的歉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 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在 1980 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其後以約 10 年的間隔舉辦一屆，至今已至第四屆。2010 年初我奉翁啓惠院長的任命，擔任副院長一職，當時思考著幾件應該進行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漢學會議。在翁院長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順利召開，上距第三屆已有 12 年，而距離第一屆更超過 30 年。30 多年來，與會的學者在改變，討論和關注的議題也隨著時空的推移，不斷的變遷。

當代社會資訊發達，空間距離縮小，連帶促進了地球村的形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漢學」已不再是專屬華人的學問，而儼然成為國際性的議題。學者關心的議題，也不再限於一時一地，而更多跨領域甚至跨國界的觀照。

從這一屆所發表的論文觀察，我感到較諸以往有幾點不同。在這裡僅以史學為例，從「主題」、「材料」與「工具」三方面略作討論。

首先是「主題」的擴展，以歷史研究為例，早已跨出傳統「帝王家譜」的框架，進而更多關注基層社會的歷史，關心人民的生活。討論的議題幾乎可說已經沒有局限而充分展現多元。

從「史料」方面講，傅斯年所揭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繼續得到重視與發揚。尤其近年來大量新材料的出土，大幅改變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這裏所說的新材料，不只限於考古出土的史料，還應該包括過去被列為禁燬或長期處於邊緣的史料，這些以往不能看或不易看到的東西，經過大量的刊印後，如今都觸手可及，無異於「新出土」，提供給學者們一個研究的新寶庫。此外，許多數位化資料庫

的建立，使得過去數十年皓首窮經都做不到的事情，現在也許一個按鍵彈指間就可獲得，為學者帶來無窮的「近用性」。當然，我也必須強調，「檢索」不能代替閱讀。

從「工具」而言，科技帶來許多研究的新工具，數位工具的興起，使研究者與材料之間的關係得到全面的改變。另外如 GIS 的應用，方便我們用空間來思考事情，也使得研究的面向從單點連結到多點、甚至擴展為全面。這些新工具的產生及應用，是過去幾屆漢學會議所無法想像的事。當然，以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可以想像到第五屆時必然會有更新的工具出現，其新異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

第四屆漢學會議的成功召開，首先要感謝翁啓惠院長的全力支持，余英時院士慨允擔任大會主席，黃進興院士和黃樹民院士力任艱巨。世界各地學者的熱烈響應，更是我們必須表示敬意與謝意的。

在會議召開一年後，全帙 22 冊的會議論文集得以出版，這要歸功於出版委員會的不懈努力以及李宗焜博士、葉光輝博士與各冊主編和學者專家的配合。不論會議期間或出版過程，還有無數的助理同仁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全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謹代表中央研究院對他們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 序

## 大會祕書處

二〇一〇年四月，翁啓惠院長由於關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指示，籌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語言研究所會同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七個研究單位，共同配合辦理。經過整整兩年的努力，遂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如期召開大會。各國應邀發表論文的學者共計有二九二位，主持與評論者計四十三人，全體與會人員更達一千六百之眾，堪稱學術界的一大盛事。

本次會議具有四大特色：首先，進行深度討論，會議論文發表者，兼做主持人與評論，角色彼此替換；其二，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區的探討；其三，新領域與新議題的開發與探索；最後，迥異於往昔只有資深學人參加，此次廣邀富有潛力的年輕學者與會，副教授以下達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會議期間，雖值颱風侵襲，與會人員一本初衷，風雨無阻，踴躍出席，討論熱烈，成果甚為豐碩。會後，復承王汎森副院長交待，成立編輯委員會，審議提交論文，俾便結集成冊。茲將最後定稿梓行，以供學界分享，並就教於諸方大家。

最後，本會議論文集得以刊行，必須感謝各分冊主編，尤其是出版委員會的編輯祕書李宗焜教授。

謹列本屆國際漢學會議攸關工作人員如下，並致謝忱：

主席兼召集人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秘書長兼副召集人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秘書長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執行秘書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籌備委員（依姓名筆畫順序）**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恭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鄭秋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顧問（依姓名筆畫順序）**

丁邦新（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賡武（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杜維明（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郝延平（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其姿（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莊炳煌（中央研究院院士、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許文雄（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國樞（中央研究院院士）

葉文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目次

|         |           |     |
|---------|-----------|-----|
| 余英時     | 開幕致詞..... | i   |
| 王汎森     | 序.....    | iii |
| 大會祕書處   | 序.....    | v   |
| 沙培德、張哲嘉 | 導言.....   | 1   |

張哲嘉 (Che-chia Chang)

|                             |    |
|-----------------------------|----|
| 逾淮爲枳：語言條件制約下的漢譯解剖學名詞創造..... | 21 |
|-----------------------------|----|

狹間直樹 (Hazama Naoki)

|                             |    |
|-----------------------------|----|
| 「東洋盧梭」中江兆民在近代東亞文明史上的地位..... | 53 |
|-----------------------------|----|

鄭宗義 (Chung-yi Cheng)

|                    |    |
|--------------------|----|
| 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哲學」..... | 69 |
|--------------------|----|

黃克武 (Max Ko-wu Huang) 韓承樺 (Cheng-hua Han)

|                                    |     |
|------------------------------------|-----|
| 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爲例<br>..... | 111 |
|------------------------------------|-----|

顧德曼 (Bryna Goodman) (李冠南 譯)

|                          |     |
|--------------------------|-----|
| 翻譯的鍊金術：民國早期上海的「經濟學」..... | 179 |
|--------------------------|-----|

阿梅龍 (Iwo Amelung)

|                  |     |
|------------------|-----|
| 晚清科舉制度與西學東漸..... | 205 |
|------------------|-----|

沙培德 (Peter Zarrow)

|                                   |     |
|-----------------------------------|-----|
| 敘事與教誨：教科書中的知識傳遞 (1902-1937) ..... | 231 |
|-----------------------------------|-----|

林郁沁 (Eugenia Lean)

閨房裡的化學工業：民國初年的家庭製造、知識與性別

..... 271

高哲一 (Robert Culp)

定義現代性：《辭源》與現代中國語彙的創制 ..... 295

# 導 言

## 現代中國知識：全球化與在地化

沙培德、張哲嘉

「中國的新知識」、「現代中國知識」、或者是「新知識潮流中的中國」，這些說法是在何等歷史脈絡下成立的呢？一言以蔽之，這些表述都是相對於傳統中國的舊知識而言的。同樣的基本問題，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表述，每種皆多多少少有其個別的設想與偏見。我們一方面須警惕自己可能會有的簡化論（reductionism）和二元式思考，不過在另一方面，現代中國知識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吸收了大量我們所謂的「西學」（Western Learning）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並不是說，現代中國知識便等同於「西方知識」（Western knowledge），而是說做為一個體系的現代中國知識，即使在知識論的層次上，基本上也與舊的知識間存在斷層。縱使我們視現代中國的各個學科為中西合璧的產物（hybrids），同時卻也不能不承認它們已確然成為與過去迥然有別的知識體系。這些學科代表的不是知識包裹的移轉而已，而是整個知識體系的性質是全新的：知識由學科來歸類，並且再由每個學科內部來個別歸類種種知識。

學界直到近年來才開始研究近代中國的知識領域。所謂知識的定義變動不居，這個重要特質已經引起注意，學者們同時也考究知識工作所用到的各種語言和工具。中國的智識生活在過去兩個世紀裡非比尋常的

轉變，已然成為眾所矚目的研究主題。這些研究早先傾向從屬於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史學傳統，但在過去十年左右，研究興趣已逐漸轉移到翻譯與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問題，另外一個重點或許可稱之為智識生活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包括了教育、出版和政治體制。這些研究取徑都和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有所重疊，但沒有一個完全一致。假如說思想史家慣於關注的是個人和小團體的觀念、由這些人所引起的論爭、以及他們的觀念在宏觀社會發展裡所扮演的角色，那麼知識史家更有興趣的是眾人存有共識之處、此一共識的發展過程和制度性基礎、以及某種知識如何適應於社會中掌握支配性的知識體系，甚或為如何與社會中掌握支配性的知識體系相互適應。

哲學家通常認為，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指的是「證實為真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 [JTB]）。也就是說，該命題性知識（「知識本身」[knowledge that]），相對於操作性知識[how-to knowledge]或對象知識[knowledge of objects]）必定為真，只要該主體或此一知識的持有者相信此一信念並予以證實。<sup>1</sup> 這一套對歷史學家來說是行不通的。歷史學家在此就和人類學家一樣：假如當地人說這是知識，那麼我們就應該以知識來看待它。正如 Peter Burke 所指出的，在知識史的發展過程當中，首先是由二十世紀初期的社會學家嘗試系統地說明，社會是如何開始接受某些思想體系為真的。<sup>2</sup> 這個取向反映出歷史主義式的體悟，換言之，隨著時空的差異，何者可被視為知識也會有所不同。更極端的觀點認為，知識本身（真假與否是以其所應用的知識論標準而定）就是社會塑造的產物（socially produced）。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如 Emile

---

1 Matthias Steup, "The Analysis of Knowledge,"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2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2/entries/knowledge-analysis/> (accessed 9 October 2012).

2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0), pp. 3-9.

Durkheim、Thorstein Veblen、Karl Mannheim，討論到知識生產的社會本質。更為晚近的一群學者回到此項議題，包含 Peter Berger 與 Thomas Luckmann、Pierre Bourdieu、Michel Foucault，尤其是所謂的科學研究學派（science studies school）。「知識生產」（knowledge production）此一詞彙意味著，「發現」（discovery）早已存在的知識這種想法大有問題。但即使是「發現」的這種觀點（認為知識並非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產生的，而是發現既存的真理），也承認發現過程有其複雜性。知識總是處於具體的法律、經濟，以及相類之神話體系、技術和藝術的制度之中，或者經由這些制度來加以表達。因此，知識在本質上就帶有社會性（inherently social）。

在某些人的眼中，知識的意涵與自然科學具有極高的一致性，這種看法主張知識必須是能複製實驗結果、預測（假設）未來結果並加以操縱時才算數。最近一個有關知識全球化的研究提出，「知識在此被設想為一個個人、團體或社會解決問題，以及在心智上預先考慮必要行動的能力。簡言之，知識就是解決問題的潛力。」<sup>3</sup> 然而，今日對於知識史的興趣，並不限定於自然科學或甚至社會科學裡的知識。無疑地，某些對於知識史的新興趣，反映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知識紀元」或至少是某種「訊息時代」的時代感。<sup>4</sup> 自從 1970 年代開始，我們就在談論當代人正處於一個「知識社會」。<sup>5</sup> 此種新型社會的首要表徵，在於一個「知識階級」透過對於公私機構的管控，達到表面上的支配地位；其次則是透

---

3 Jürgen Renn and Malcolm D. Hyman,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in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in Jürgen Renn,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in History* (Berlin: Edition Open Access, Max Planck Research Library for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2012), p. 20.

4 可參見 John Seely Brown 與 Paul Duguid 的嚴謹考述：*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0)。

5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過電腦和網路，資訊看上去似乎是鋪天蓋地而來。但這個知識社會真的是人類社會的新形式嗎？Peter Burke 舉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他指出近代早期的歐洲已有對於知識的新構想，並藉此將大量知識串連起來。政府在促進與運用知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十七世紀時已十分明顯，這些可以從王室對海外探險、天文學、以及一般性的科學學會的支持看得出來。到了十八世紀晚期，政府的角色變得更加吃重，因為殖民統治需要掌握在地的知識。而由殖民政府創造的官僚知識技術，又可以被母國政府再應用。<sup>6</sup>

相反地，儘管我們可說是生活在一個知識社會，但這個社會卻是建立在不牢靠的懷疑論沙堆之上。<sup>7</sup> 或許知識社會真的是由多種不同領域的專門技術（expertise）共同運作下的社會。這些領域形成一個工作信念的叢集（a congeries of working beliefs），姑且將其當作知識。假如一個既定領域的內在矛盾變得太過明顯，或一套既定知識失去其實用價值，這套知識有可能喪失原有的地位。假如總體系統運作得當，懷疑論就不是一種信心的欠缺，而是自我更正的機制。「知識」因此包含了訊息（或經驗上可驗證的事實）和信念（由歸納性推論所達到的高級知識）。在此意義上知識是生機盎然的。因為新的訊息經過加工或學習，而且是建立在諸如學校、出版社、圖書館、檔案館與實驗室之類的制度之上。知識體系與一定範圍領域裡進行中的工作相互連結，因而將自身概念化為一個體系。

現代大量的訊息以及支持建造知識的廣泛基礎設施，造就了新的知

---

6 Timothy Mitchell,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7 正如 Anthony Giddens 觀察到的，「懷疑，即現代批判理性的普遍特點，滲透進日常生活和哲學意識之中，並形成當代世界一般性的存在面向。現代性將極端的懷疑原則制度化，並堅持所有的知識都採取假設的形式……。」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

識社會基礎：專家和專門技術者（specialists）的角色。可以說他們因此與傳統社會裡的知識階層區別：現代專家要求要有特定領域的知識，而舊的知識階層則聲稱擁有廣泛而普遍的知識。然而筆者在此想要指出：對此二元式區分應在兩方面有所保留：首先，舊知識階層的成員在實際上往往也專精於一項事務。在中國，學者們也許專研《禮記》或歷史，相對於《易經》或詩歌，亦或是農藝、數學或其他許多領域。此外，世界各地都有精通醫術、法律等專門領域的人士，中國自然也不例外。<sup>8</sup> 然而，最具權威和受到尊崇的高級知識仍然是博雅性的知識（general knowledge）。知識階層更進一步對於國家或社會肩負了道德責任，中國的士人階層是最顯明的例子。知識、合宜生活與社會良善三者相互連結，因而構成傳統知識階層的根本前提。相比之下，現代性的標誌則是尋求純粹知識（pure knowledge），嘗試從生活經驗的討論中分離出純粹知識。<sup>9</sup> 今日很少有知識從業人員會聲稱其專業能夠解答所有的道德或宇宙論問題，更少有人仍會堅稱懂得所有的知識。這再次是出於懷疑論的作用，以描繪出承認不可知為可知之處（what can be known is to acknowledge what cannot be known）。儘管現代存在著懷疑論，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當然還是擁有前所未有的之多的知識。這些知識究竟從何而來？這是史家可以提供解答的問題。

---

8 正如 Charlotte Furth 所論證的，研究中國的史家可能低估了中國菁英份子專業化（specialization）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帝制晚期：“Introduction: Thinking with Cases,” in Charlotte Furth, Judith T. Zeitlin, and Ping-chen Hsiung, eds.,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20-21. 但是他們之所以如此低估，是建立在某些菁英份子的自我形象之上。即使在某種程度上是自我蒙蔽，這些菁英份子仍然維繫一種看重通才或「業餘」理想的傳統。見：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1: 15-43.

9 比較 Bruno Latour, trans. Catherine Porte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所說的那些「將自然與文化，以及科學與社會加以絕對區別」（p. 99）之自我神話化，建立於認為「將自然區別於社會構造，從而保證自然的超越性面向」（p. 139）的一種觀點。

不過，本冊論文集所提供的只是一個非常局部而有限的初步探索，針對一些從近代中國之新知識考究所出現的主題而來，所收諸文討論文化菁英們面對新知識時的斟酌苦思。這些知識之所以為「新」，乃是由於從西方而來。既顯新穎，又係外來。一方面引人猜疑，卻更讓人充滿好奇，同時也是工作的對象。諸篇論文談及翻譯與概念進入中國脈絡之改寫（adaptation）的議題，以及科舉制度和印刷工業等等諸如此類的環境條件（conditions）。儘管這麼作有點武斷，但本書所收論文可大致分類為翻譯與知識之生產／傳播。這些範疇至少具有某些啟發性的價值（heuristic value），雖然絕非近代中國知識史研究的全部基礎，但確實可使我們得以一窺許多中國的現代知識。

這並不是說曾經存在過一個明確的「前現代知識」，可據以衡量和對照「現代知識」。中國的知識文化門類繁多，而且時有消長。<sup>10</sup> 中國從十九世紀開始的知識文化變遷，受制於社會經濟與政治脈絡的程度，不亞於知識體系內容本身的改變。此處所指的「文化」，意在強調產生

---

10 關於近代早期中國的知識與知識傳播體系，學界的研究成果已多。尤其是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Francesca Bray,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and George Métailié, eds.,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Warp and the Weft* (Leiden: Brill, 2007); Dagmar Schäfer, ed., *Cultures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Brill, 2012); Dagmar Schäfer, *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以及討論書籍文化: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 HUA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 eds.,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rill, 2011).